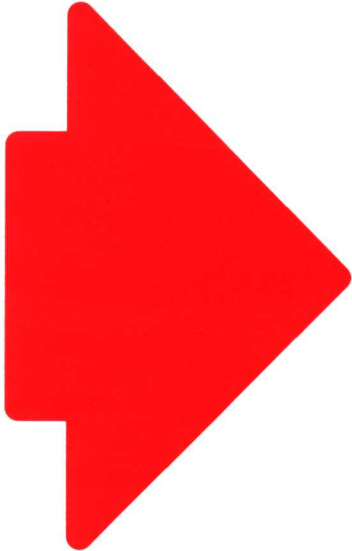




中国干部教育 (1927-1949)



陈桂生 著

领 / 导 / 教 / 育 / 学 / 大 / 系

中 国 干 部 教 育 (1927 - 1949)

陈桂生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干部教育(1927—1949)/陈桂生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领导教育学大系)

ISBN 978-7-5617-5532-7

I. 中… II. 陈… III. 干部教育—历史—研究—中国—1927—1949 IV. G72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3668 号

领导教育学大系

中国干部教育(1927—1949)

著 者 陈桂生

策 划 奚洁人 朱杰人

项目编辑 王 焰 吴海红

文字编辑 陈锦文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封面设计 上海成志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6.75

字 数 28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一次

印 数 4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532-7/D·127

定 价 4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领导教育学大系》总序

领导教育,在中国主要是指干部教育,是领导干部成长进步的重要途径,是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保证,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处于战略性、基础性地位。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培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领导教育事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领导教育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中央作出的“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等干部教育的战略决策以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和《2006—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颁行,标志着我们党对干部教育培训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我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进入了新的阶段,标志着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日臻完善。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创建学习型组织,人人学习,全员培训,越来越得到各级各类组织的重视,正成为广大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研究教育培训,加强领导教育理论探索,已成为领导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领导教育学作为一门以领导教育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尚处在初创阶段,无论是与领导学的一些分支学科相比,还是与教育学的相关学科相较,都还略显稚嫩。它的发展,离不开对领导学、教育学学术资源的借鉴,离不开诸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滋养,离不开对国外领导教育理论及其先进经验和做法的借鉴吸收,更离不开对中国丰富的领导教育思想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当前领导教育中重大现实问题的探索研究。理论指导实践,但前提是理论要来源于实践,领导教育学亦是如此。我国历史上宝贵的领导教育经验以及古人对领导教育的精彩论述,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不同时期掀起的教育培训高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领导教育的重要指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决策,近年来各地、各系统在

干部教育培训方面所进行的创新探索,等等,都是领导教育学产生的重要土壤,是领导教育学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循着历史的线索,梳理由古至今领导教育的思想,提炼古往今来领导教育的实践智慧,是领导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条件。本套丛书中《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探究》、《中国干部教育(1927—1949)》、《中国干部教育(1950—2006)》、《西方领导教育史》、《国外领导教育与培训概览》,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来撰写的。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有其基本概念和范畴,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命题和原理,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问题域,《领导教育概论》承担着领导教育学建构的使命,着力使领导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自立于诸学科之林。领导教育学既需要有哲学层面的思辨,也需要有科学层面的规定和操作层面的要领,由此《领导教育基本方法》、《领导素质测评》以领导教育学中“学”与“技”(区别于哲学层面的“道”)的面貌出现。《领导教育学大系》的这种总体设计,旨在一定程度上能使领导教育学学科框架的总体形态得到初步显现。同时,在编撰中力求使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科与问题相参照,以使之成为丛书的主要特点。

《领导教育学大系》的问世,首先得益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同建设的国内第一个领导教育学博士点。博士点专业建设的要求,博士生以及硕士生培养的需要,催生了领导教育学诸多问题的研究与深入思考。在此对华东师范大学尤其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表示由衷的感谢!这套丛书的问世,也得益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朱杰人社长、王焰副社长的慨然应允,吴海红编辑的精心加工,使丛书能及时与读者见面,在此深致谢忱!这套丛书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各书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教师,他们焚膏继晷、条分缕析、剔弊理纷,使领导教育学的多层次多侧面内涵得以清晰显示,深化了我们对领导教育问题的认识,促进了领导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以领导教育为选题,编写系列丛书,在国内尚属首次,国际范围也鲜见同类著作。既属初创,难免粗陋,敬请指正!领导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意味着领导教育学研究的开端,离真正确立领导教育学的学科地位还有着不小的距离,我们诚挚地期望广大读者对我们的研究提出宝贵意见,更期待着更多的同行关注、支持领导教育学的研究和发展!

奚洁人

2007年10月

“根据地干部教育史”研究旨趣

当开始考虑中国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史问题时,首先面临一个困难的抉择,即:所要研究的到底是怎样的“干部教育”的历史,是按照人民共和国时期所理解的“干部教育”追溯其过去,还是按照当年(1927—1949年)的“干部教育”概念,陈述那时“干部教育”一词指称的事实。

欲问这两种选择的区别何在,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否重要,就得从“干部”概念谈起。

“干部”一词原是法文 Cadre 的日文对译词。法语 Cadre 原义为公务人员,而在我国流行的“干部”一词的含义却较为宽泛。“干部教育”更是我国从根据地时期开始的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

在中国,“干部”一词较为严格的含义,是指脱离物质生产中的体力劳动、从事公共事务的人员。通常称为“脱产干部”,以示同工人、农民以及其他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在我国,迄今为止,列入“干部编制”的人员,不仅是行政长官、公务员,还包括共产党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中的专职人员,国营企业、事业组织中列入“干部编制”的人员,包括学校中的校长和教师;“干部”作为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在同“群众”对举的语境中,又带有“领导人员”的意思。故在根据地教育发展的一定时期(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曾把整个教育分为“干部教育”与“群众教育”两大部类,以突出“干部教育”的地位。

其实,那时实施“干部教育”的学校,几乎成为“公立学校”的同义语,而与此对举的“群众教育”(其中包括初级小学与成年群众教育),则是“民办教育”的同义语。根据地的“干部教育”,一向以党务干部、政府干部和军队干部为主要对象。这类干部教育以政治、军事教育为主,兼施文化与业务教育。在1943—1944年教育改革以后,因把高级小学以上的教育列入“干部教育”范畴,高级小学、中等学校名称虽未改变,而实际上趋于“干部教育化”。

在我国,由于已形成“干部教育”的传统,至今仍然存在一个独立的“干部教育

系统”。据2003年统计,如今这个系统拥有4501所县以上培训基地(包括党校、行政院校、各部门各系统的干部培训院校和培训中心)。不仅规模庞大,其重要性更不可低估。不妨说,主要着眼于现行“干部教育”,才产生回顾干部教育历史的考虑,从而要求所治“干部教育”的专史,不失“古为今用”的价值。

问题是现行“干部教育”概念,其内涵同昔日“干部教育”已有显著区别,其外延也有很大差别。它们之间只有程度有限的可比性。以往那种“干部教育”,不仅是现行“干部教育”的源头,同时也算得上是如今许多地区高级小学、中等学校和大学的“历史”。

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干部教育,毕竟早已远去。曾经困扰前人的许许多多有关“干部教育”的争议,现在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对于曾经导致不少志士仁人因此作出牺牲(其中包括无谓牺牲)的一些干部教育争端,今人惟有扼腕叹息而已。曾经耗费前辈大量精力的干部教育建树,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以后,大都成为陈迹。我们还有多少兴致去清理那些陈年旧账呢?

然而,对于干部教育的历史,不理便罢,一旦梳理这种教育的专史,就该尊重那段历史的真实。这才是应有的“史德”。如果按照现行“干部教育”的口径或某些人的趣味,去剪裁它的历史,即使以“古为今用”自诩,终究有伪造历史之嫌。那样的“史书”,虽不少见,不写岂不更好?

事实上,我国干部教育的历史,并没有“断裂”。尤其是历史形成的“干部教育”价值观念,尚未完全从人们的意识中消失,以至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曾几度重新挑起根据地干部教育中的争议。以1958年重新批判“正规化教育”和为“游击习气”翻案,最为引人瞩目。“教条主义”帽子不时飞舞,更属常情。此外,“回到老解放区去”办“抗大式的学校”,亦不少见。还打过大学“向党校看齐”的主意,更不用说把学生赶到农村去,“以社会为课堂”了。

纵观世界各国,虽有行政学院的设置,也有公务员培训,大企业、大事业单位亦有各级专业人才的培训,恐怕惟有中国至今仍保持独立的“干部教育系统”。除一般党校、行政院校以外,还新设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与浦东干部学院作为补充,这是我国干部教育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扬。也不妨说,如果不研究我国干部教育的历史,不明白现行干部教育与以往干部教育历史使命与实际情况的区别,甚至还受历史形成的“干部教育”观念束缚,干部教育是很难创新的。

马克思在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的经验时,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

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惟其如此，“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欧洲1848年革命的情况正是如此。“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①，从而导致失败。其教训表明，倒是曾经有进步意义的传统（即通常所谓“优良传统”）才更“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然而历史条件毕竟发生了变化，对以往的传统若不加以分析，便可能妨碍人们去发现现行实践应有的历史内容。所以，历史只能“借鉴”，而不应照样重新排演。不过，这面“镜子”如果模糊不清，无法用以同现实对照，也就丧失“借鉴”的功能。

话虽如此，尽可能如实地陈述干部教育的历史，又谈何容易？因为中国革命根据地不仅经历苏区（苏维埃区域）、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三个历史阶段，而且在各个历史阶段，除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外，从北方到南方还存在许许多多大块根据地。每个根据地的情况前后又多变化。干部教育时起时伏，干部学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是常有的事。至于干部教育中的争议，以及由此波及一般学校办学取向之争，其中贯穿于整个根据地教育历程中的那些大是大非，更待澄清。

说是这么说，如今治“干部教育”专史，受史才、史学、史识与客观条件限制，使其勉强成为“镜子”，且是今人可看的“镜子”，的确是真正的难题。面对如此难题，那就只能以“史德”相许了。

陈桂生

2007年7月1日沪上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目 录

序 “根据地干部教育史”研究旨趣	1
------------------------	---

I 苏区干部教育/1

1 苏区：“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3
一、国民革命高潮中干部教育与群众教育的大演习[3] 二、国内教育危机[4]	
三、如日初升的苏区教育运动[8]	
2 井冈山红色教育的星星之火	11
——根据地干部教育历史性的开端	
一、红军教育的创造[12] 二、从党内干部教育到地方干部教育[13]	
3 红军干部教育系统	16
一、红军教育的崛起(随营学校时期)[16] 二、向“正规化”过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时期)[18] 三、“正规化”的军事干部学校时期[21]	
4 中央苏维埃政府直属干部教育系统	24
一、苏区教育中处于优先地位的干部教育[24] 二、干部教育系统[25]	
三、从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到苏维埃大学[26] 四、职业学校[29]	
五、在职干部学习[31]	
5 共产党干部教育系统	33
一、共产党干部教育中的倾向[33]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34]	

- 6 战地黄花分外香 36
——各地方苏区干部教育
一、各地方苏区概况[37] 二、闽浙赣苏区干部教育[39] 三、湘鄂西苏区—湘鄂川黔苏区干部教育[40] 四、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干部教育[45]
五、左右江苏区干部教育[48]
- 7 关于“共产主义教育”方针 51
——苏区干部教育取向辨析之一
一、不切实际的指责[52] 二、“共产主义教育”方针问题何在[53] 三、列宁的“共产主义教育理论”的误用[55] 四、“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辨析[56]
- 8 关于“正规化”与“游击主义残余” 58
——苏区干部教育取向辨析之二
一、苏区干部教育从非正规到“正规化”的转变[58] 二、“正规化教育”的问题何在[59] 三、“正规化教育”论者的自相矛盾[62]
- 9 关于“狭隘经验论”与“教条主义” 64
——苏区干部教育取向辨析之三
一、虚构的“狭隘经验论”帽子[64] 二、实在的“教条主义倾向”[65]
- 10 苏区干部教育的历史地位 67
一、实事求是地评价苏区干部教育的成就[67] 二、从比较中考察苏区干部教育的历史地位[68] 三、从苏区实践中提出的干部教育的新课题[69]

II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干部教育/71

- 1 中共中央直属干部学校系统 74
一、干部学校系统的形成[74] 二、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央研究院[75]
三、军事院校[76] 四、干部培训性质的大学和学院[78]
五、干部院校的调整[83]

2	在职干部教育的改革	88
	一、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及其问题[88] 二、在职干部教育改革的动向[91]	
3	干部教育制度历史性的变革	94
	一、干部教育“正规化”取向[94] 二、中共中央主持的干部学校改革[95]	
	三、干部学校的整风[96]	
4	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	103
	一、林立的干部学校与干部训练班[104] 二、活跃的在职干部教育[106]	
	三、干部教育改革[108] 四、干部教育“地方化”取向[110]	
5	中等学校“干部教育化”的历程	113
	一、陕甘宁边区中等教育概况[114] 二、中等学校修业期的不同选择[116]	
	三、中等学校性质与职能的“正规化”取向与“干部预备教育”取向[117] 四、中等学校课程的“正规化”取向与“干部预备教育”取向[120]	
	五、中等教育“地方化”取向[126]	
6	抗日烽火中的教育熔炉	129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	
	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129] 二、中共中央北方局直属干部学校及华北地区的军队干部教育[132]	
7	抗日烽火中的教育熔炉	134
	——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	
	一、大江南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134] 二、中共中央华中局直属干部学校[135]	
	三、华中地区的军队干部教育[136]	
8	抗日烽火中的教育熔炉	138
	——华南人民抗日游击区的干部教育	
	一、东江游击区的干部教育[138] 二、琼崖游击区的干部教育[141]	

III 解放区的干部教育/144

- 1 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147
 - 一、扩大教育界的统一战线,进一步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147]
 - 二、稳妥地接管原有教育设施[150]
 - 三、加强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的教育与改造[151]
 - 四、向“新型正规化”教育方向迈进[152]
- 2 西北解放区的干部教育 154
 - 一、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155]
 - 二、晋绥边区的干部教育[157]
 - 三、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直属干部学校[159]
- 3 华北解放区的干部教育 160
 - 一、晋察冀边区的干部教育[160]
 - 二、晋冀鲁豫边区的干部教育[163]
 - 三、华北解放区的干部教育[169]
- 4 东北解放区的干部教育 172
 - 一、在动荡中开辟民主教育的新天地[172]
 - 二、新型的人民的大学的崛起[174]
- 5 华东解放区的干部教育 177
 - 一、山东解放区的干部教育[178]
 - 二、苏皖边区的干部教育[181]
 - 三、中共中央华东局直属干部学校[184]
- 6 中原解放区的干部教育 186
 - 一、中原解放区的干部教育[187]
 - 二、知识分子政策与接管城市学校政策[187]
- 7 新型高等学校的崛起 189
 - 一、实施干部教育的大学与实施高等教育的大学[189]
 - 二、向新型大学转变[192]
 - 三、高等教育的重建[192]

IV 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探索根据地教育道路的前驱/195

- 1 红色教育部长瞿秋白 197
 一、在苏区教育事业中的建树[197] 二、关于“教育系统的检举运动”的检讨[199]
 三、复杂环境中的复杂人物[200]

- 2 洛甫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理论形成中的贡献 203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独到见解[203] 二、对苏区“共产主义教育”方针的自我否定[205] 三、在根据地教育实施中的实际影响[207]

- 3 徐特立在根据地教育事业中的建树 210
 一、对根据地特殊教育环境的分析[210] 二、在教育改革运动中[212]
 三、关于根据地教育的独到见解[214]

- 4 吴玉章在根据地教育事业中的建树 218
 一、根据地文化教育界统一战线的组织者[218] 二、拉丁化新文字教育的开拓者[219] 三、干部教育的中坚[221] 四、创造人民教育的新天地[223]

- 5 成仿吾在根据地教育事业中的建树 225
 一、开创鄂豫皖苏区教育的新局面[225] 二、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专任教员[228]
 三、主持陕北公学[228] 四、在敌后“战火中”坚持教育阵地[229]

- 6 罗迈在根据地教育改革中的探求 232
 一、新型干部学校经验的概括[233] 二、在在职干部学习运动中[234]
 三、干部学校正规化的尝试[235] 四、在 1942 年干部教育改革运动中[237]
 五、在 1944 年群众教育改革运动中[239] 六、根据地教育研究的组织者[242]

- 7 “学习化社会”的曙光 244
 一、现代教育制度演变的趋势[244] 二、我国根据地时代的“终身教育”与“学习化社会”[247] 三、用另一种眼光回望根据地教育遗产[248]

- 跋 250

I

苏区干部教育

引 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发展,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红色政权”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人民战争、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政权)三个基本方面。这三个基本方面奠定了这一独特道路的思想基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教育,由于密切结合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和工农民主政权的建设,才突破外国那种“正规化”的办学道路,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

土地革命战争开始时,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此为基础,后来形成湘赣根据地。自1929年初,红四军转战于赣西南、闽西广大地区,建立赣西南和闽西两大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随着斗争的发展,除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外,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还开辟了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1932年1月,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西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同年11月7日,举行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法律上代表所有各个根据地。由于敌对力量的包围、分割,实际上直接管辖的,主要是中央革命根据地。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论者说法不一。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法,当指赣西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各个革命根据地都曾进行过有成效的教育改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向井冈山进军到1931年1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权建立为前期;从1931年中央工农民主政权建立

到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为中期；从 1935 年遵义会议到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为后期。

如果说由于革命斗争重担主要由成年人负荷，成人教育比儿童教育更有现实意义，那么，在成人教育中，干部教育又比群众教育更有迫切意义。这不仅由于群众工作需要干部领导，还因为根据地干部队伍文化基础薄弱。

苏区：“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 一、国民革命高潮中干部教育与群众教育的大演习[3]
- 二、国内教育危机[4]
- 三、如日初升的苏区教育运动[8]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同中国国民政府统治的白色政权分庭抗礼，“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十分尖锐。军事上与文化上都是如此。当时国民政府统治区文化教育面临危机，相对说来，苏区教育机关与学校则号称“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1927年以前，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高潮，展开过反帝、反封建教育的大演习。

在北伐战争准备阶段和北伐战争中，各种新型革命学校在国民革命的春风雨露哺育下应运而生。其中有：以研究和宣传革命理论为宗旨的大学，如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等；以推动国民革命为宗旨的军事政治学校，如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后来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讲习班等；工人运动干部学校，如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教育委员会创办的劳动学院；农民运动讲习所，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妇女运动干部学校，如平民女子学校、妇女运动讲习所等；中学，如湘江中学、武汉中学等；劳动（工人）补习学校，如在1923—1926年间，单是安源路矿，就有工人补习学校7所，工人读书处13处，还设有师范班、妇女职业班；农民夜校，在农民运动发达的县份，几乎达到每乡1所。

更加可贵的是，这一切教育设施，大都以国民革命为宗旨，以平民主义为方向。其中有的学校进行了民族形式（书院）与科学内容结合的尝试（湖南自修大学），有些学校创造了讲习结合的经验（如各种讲习所）。在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文化运动中，已出现由群众自己办学、办适合群众需要的学校这种意义深远的教育实践的端倪。

这是中国革命教育的大规模演习。

随着 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国民革命教育运动的设施几乎丧失殆尽。然而,革命教育运动毕竟在四面八方传播了革命火种。首先突破旧世界防线的区域,大都是打过国民革命深刻烙印的地区;首先响应中国共产党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号召的人民,大都是经受过大革命洗礼的人民。

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在这个时期,自身的理论准备不足。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准备时间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短得多,对于中国历史特点和革命基本规律还在摸索中。既得到共产国际支持,又不免受其牵制。整体说来,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尚处在萌芽阶段。那个时期还缺乏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大规模发展所需要的历史前提,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的建立。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掌握了一部分实际权力,在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方面尤其是这样,但是,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不能不受到国民党各派势力牵制。虽然办起了颇有影响的干部学校,毕竟只是凤毛麟角。至于蓬勃发展的群众性教育事业,免不了带有自发性,最后也随着工农运动失败而遭受摧残。随着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展开,才开创了人民教育的新局面,使北伐大革命时期的国民教育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

从此以后,国内出现壁垒分明的两种政权:国民政府统治的白色政权与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红色政权。相应地产生两种性质不同的教育。

二

国民党新军阀上台以后,曾经鼓吹“教育为立国之大本”,但国民政府统治区的文化教育,却每况愈下。以同中央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犬牙交错的江西、福建两省为例,据当时官方统计,情况如下:

省份	小学校数 (所)	小学生数(人)			地 域	统计年度
		总 数	男生数	女生数		
江西	7 742				79 县	1929
	7 356	244 038	194 735	49 303	省会及 54 县	1930 ^①
福建	3 030	206 414	173 346	33 068	缺连城、龙岩、长汀三县	1930 ^②

①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 1934 年版,第 440、442 页。

② 同上书,第 448、449 页。